

學林

◀ (上接5版)

道出苦衷：“我近来旧病发得颇厉害。……本来近日未免过劳……在学校总是不能节劳的。”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的，6月14日信中说：“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，这几年来，国忧家难，重重叠叠，自己身体也不如前。”

1927冬季，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，对身体伤害极大。11月14日致梁启勋函说：“日来旧恙微发，大抵因连作两文之故。（一、《王静安先生纪念号》序；二、张子武《墨经通解》序）”12月12日，再次证实医生所说过劳的危害：“我的病本来已经全愈了，二十多天，便色与常人无异，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，（实是万不能不做的，但不应该接连着做罢了）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。如此甚属讨厌，若完全叫我过‘老太爷的生活’，我岂不成了废人吗？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。”

次日，给梁思顺的信说：“我的体气底子本来极强，这点小病算什么。况且我已经绝对采用你们的劝告，把养病当一件大事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呢？”又告诉女儿：“近来著述之兴大动，今晚本又想执笔，被王姨捣乱干涉。”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，实际不矛盾，梁启超“养病”只是说说而已，著书立说才是首要。病情无情地加重，梁启超没有预感到所剩余的时光不多，他劝在加拿大的女儿不要急着回国探亲，说：“外交部又不调动你们，你索性等我六十岁时才回来祝寿也不迟哩。”一贯乐观的梁启超，认为再过五年才六十岁，过六十大寿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。12月17日致梁启勋函说：“昨又小小发烧，静眠廿余小时乃愈。老态渐露，动辄有小病，殊可厌也。”月底再函：“吾数日来旧恙又剧发。”

在国外或身边的子女无不规劝父亲以养身为重，工作的事可缓就缓。梁思成事后说：“家人苦谏节劳，然以学问欲太强，不听也。”

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清楚的，1927年7月1日给梁启勋的信说：“至于病的远因，恐怕总是因为一个腰子，分泌力到底差些，所以易出毛病。”自1928年起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发病不断。

4月初，“头晕接连两日，呕吐只一次，今日已全愈了。原因是在四五日前，精神太好，著述兴味太浓，一时忘了形，接连两晚破戒，晚上也做

些工作，以致睡不着，而早上又已起早惯了，因此睡眠不足，胃的消化力便弱起来（头晕全是胃的关系）。”过劳导致头晕呕吐，都是旧疾隐患、体弱多病的表现。

6月中旬，还是因过劳，“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，一连赶了三天，便立刻发生影响，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。”万般无奈之下，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的工作。

辞去国立图书馆馆长职务，还继续操劳《中国图书大辞典》的编纂，1928年8月28日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：“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，但廷灿屡次力谏我，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，常常工作过度，于养病不相宜。”此时的疾病已相当严重了，“一个不提防，却会大发，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，但经两三天的苦痛，元气总不免损伤”，所以“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，连这一点首尾，也斩钉截铁的辞掉”。

国立图书馆的职务是6月辞去的同时，还辞去清华研究院的工作，在5月8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述说心中的极不情愿，想继续撑着。“清华研究院到底不能摆脱，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。虽不能摆脱，亦无妨，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。”

仅过了四个月，10月17日梁启超给梁思成写信，讲述自己因医治痔疮，却“上协和一个大当”：“他只管医痔，不顾及身体的全部，每天两杯泄油，足足灌了十天，（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，说是两礼拜继续吃，若吃完了，非送命不可）把胃口弄倒了。也是我自己不好，因胃口不开，想吃些异味炒饭、腊味饭，乱吃了几顿，弄得胃肠一塌糊涂，以致发烧连日不止。（前信言感冒，误也）人是瘦到不像样子，精神也很委顿。”信中特别思念大女儿思顺：“我在病中想她，格外想得厉害，计算他们到家约在阳历七月，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。”这是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》刊载的最后一封家书，梁启超期盼的明年北戴河的家庭团聚，最终未能实现。

二

国内军阀混战，党派争斗激烈，梁启超形容1926年局势时说：“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，但隐忧四伏，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。将来破绽的导火线，发自何方，现在尚看不出。大概内边是金融最

危险，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……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，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，真是不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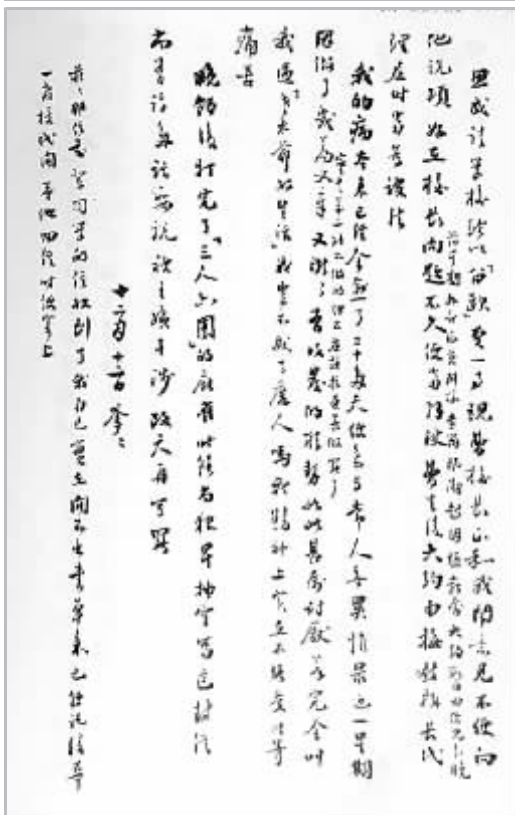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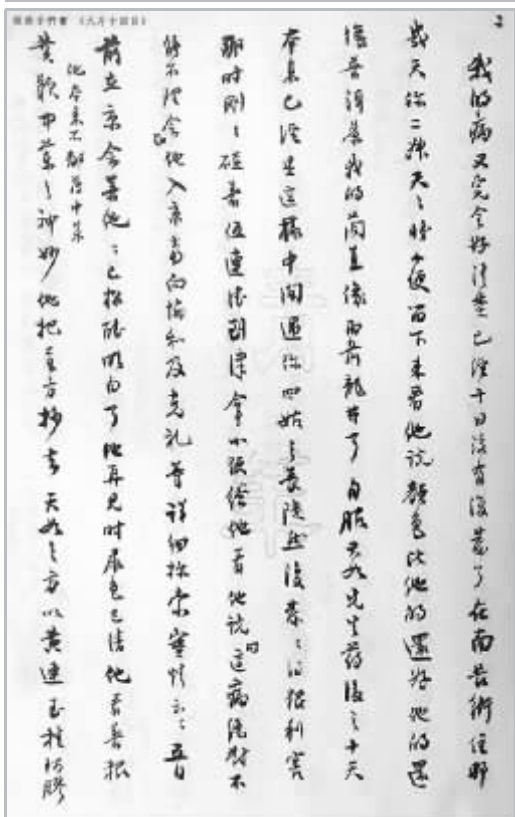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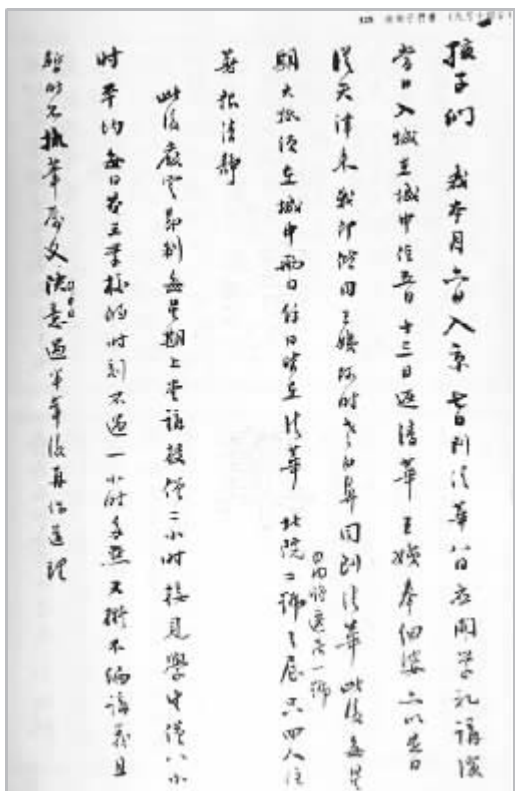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。1927年5月5日《致孩子们书》说：“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。近一个月以来，我天天被人（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）包围，弄得我十分为难。……其中进行最猛烈者，当然是所谓‘国家主义’者那许多团体，次则国民党右派的一部分人，次则所谓‘实业界’的人。（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）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，成一种大同盟。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，以为我肯挺身而出，便团结了，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。”

这些团体或个人，百般纠缠，耗时耗力，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梁启超的名声，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。梁的态度是：“多数人——尤其是南方的智识阶级，颇希望我负此责任，我自审亦一无把握，所以不敢挑起胆子。日来为这大问题极感苦痛，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罢。”过多的纠缠，使得梁启超身心疲惫。

梁启超实在苦不堪言，对儿女说：“我一个月以来，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，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，一提起来便头痛。因为既做政党，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，不愿做的事也要做，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。”梁启超对人对自己都是认真负责的，特别是国家大事：“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，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。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。”

在纠缠、烦恼、失眠、无奈中，梁启超并没有逃避，而是寻求解决办法，终于想出了应对方法：“决定自己的立场了”，“我一个月来，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（多年来）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。自己有确信的主张，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，虽未能有很惬意贵当的，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，非打破不可。”梁启超还是以他一贯的做法——以著书立说来“救中国”，他说：“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……”

纵有众多事物纠缠梁启超，令他烦恼至极，可他还安慰子女说：“我虽然为政治问



(下转7版) ▶

梁启超家书手迹